

第2卷第2期, 2009年5月

(本期译自 Number 55, Spring 2009,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Vol. 2, No. 2, May, 2009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高等教育与目前的经济衰退.....	33
金融危机对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35
美国大学里的穷人与富人.....	37

国际问题

地区性引文索引在全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39
披着校长外衣的狼.....	41

国际化的模式与问题

博洛尼亚进程: 疲惫不堪的跨越.....	44
波兰国际化中的问题.....	46
双学位和联合学位项目: 双重收益还是重复计算?	48
美国的留学生: 2007/08 学年的门户开放调查报告.....	50

学术职业

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关键地位.....	52
学术职业: 哥伦比亚 2019 年的愿景.....	54

私立高等教育

中国民办高校的问题.....	56
----------------	----

统计问题

进一步探析经合组织的高等教育统计数据.....	58
国际比较中存在的问题.....	60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香港本科教育的重构.....	62
----------------	----

新书简介.....	64
-----------	----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主办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编辑：吴 燕

刊号：沪（K）第 0621 号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5947*13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Addres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5947*13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国际高等教育》简介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将努力发挥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桥梁作用。

本刊由两部分组成：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中文版，每年 4 期；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围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编辑出版的专辑，每期一个主题，每年最多出 6 期。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每期包含十余篇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以及新书简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辑的专辑则包含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生教育、科学英才迁移等热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综述文章、书评以及有关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is an online journal with an aim of playing the role of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It consists of 4 issues each year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 in USA and up to 6 issues each year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rank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Each issue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y Boston Colleg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of short articles covering major aspect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new publications. Each issue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ains original studies, preliminary reports, review pap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ook reviews,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selected topic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s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gse.sjtu.edu.cn/en/>.

美国高等教育与目前的经济衰退

David W. Breneman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加里教育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硕士培养项目主管

电子邮箱: dwb8@virginia.edu

对曾经发生于1973~1975年、1980~1982年、1990~1991年和2001~2003年的4次经济衰退的回顾表明,美国的高等教育总体上很好地经受住了这些经济风暴的考验(高等教育纪事报,2008年10月10日)。但是大部分观察家都认为,官方宣称的开始于2007年12月的这场经济衰退非常与众不同,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具有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具体来讲,目前的经济衰退可能是长期的,范围波及全世界;它起源于金融领域,导致货币政策相对失效,同时造成消费和投资需求急剧下降。被忽视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正通过旨在增加经济总需求的积极财政行动重新兴起。长期的经济衰退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已经从20世纪30年代的错误中吸取了经验教训。然而,经济前景模糊,情况可能比二战后的其他经济衰退都更为严重。当前的危机对美国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呢?

困难初现端倪

虽然尚未发现确切的证据,但预警信号比比皆是。大多数州政府都正面临税收急剧下降的问题。由于各州必须在预算平衡的规则下运营,因此每天都能听到开支削减的报道。近来,华盛顿州、内华达州、得克萨斯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和南加利福尼亚州等都宣布削减州政府投入到公立高校的经费,削减幅度从10%到36%不等,几乎没有一个州能避免这种情况。虽然州政府对公立高等教育的投入在高校总收入中的比重已连续下降二十多年,但这一次经费削减的严重后果可能迫使公立高校的领导者缩小学生规模,而这通常是他们不愿意做的。比如,加州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系统最近宣布,计划

减少数千个的本科招生名额。州政府新一轮的经费削减行动将导致公立高校的学费上涨,进一步抑制需求。

在过去的经济衰退中,由于刚刚失业者放弃再就业的机会成本降低,高等教育入学率确实出现跳升。虽然目前还不肯定,但这种入学激增现象在本次经济衰退中可能不会发生,部分原因在于收入下降时高校不愿意继续扩招,以及学生费用的上涨和经济的不确定性。由低利率造成的无节制借贷在美国已经持续数年。而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家庭和企业都在解除不可承受的债务。在高等教育中,学生费用的支付已经变得更加依赖于贷款。但目前的情况是:不仅从信贷市场更难借到钱,而且越来越多打算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可能也不愿意为了接受教育而借更多的钱。

这种现象可能会对潜在的研究生和专业学位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包括那些原本可能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州政府支持力度和捐赠的减少,导致今年新的终身教职数量锐减。由于许多高校教师的定额供款养老金计划(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的市值缩水了40%或者更多,因此退休人数会减少,进而增加高校的开支。许多高校教师将继续工作到70多岁,而不是选择退休,把职位让给工资水平较低的新博士。

作为收入多元化的途径之一,公立和私立大学近年来都非常重视私人资金的募集和大规模捐赠基金的建立。许多大学已经公布,其捐赠基金在2008年损失了25%或更多。事实上,几乎所有资产的市值都减少了。如果把来源于捐赠基金的支出限制在每年5%左右,则意味着从捐赠基金中提取更少的资金;如果提取的资金增加,则捐赠基金无法长期

负担。重要的捐赠人是否能够或者愿意继续像以前那样提供大量的新捐赠，当前还不清楚。

前景

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2009 年的新情况，以及奥巴马政府实施的财政刺激计划能否重振经济。然而，长期的经济衰退和缓慢复苏可能促使高校重新审视其政策和做法，并停止一些被高等教育评论者抱怨多年的奢侈浪费行为。他们认为许多经费被用于学校地位和声誉的竞争，以及为学生提供接近豪华程度的住宿、服务和设施。如果家庭被迫缩减其开支并降低期望（或自愿这样做），这种压力将肯定由其子女所就读的高校来承受。正如文化变革倡导“绿色”校园和工作场所一样，学校可能被要求提供一种更

加精干而严格的学术体验，向学生收取更低的费用。

高校的领导者、董事会成员以及政府主管教育的官员面临着以下挑战：无论经济采取何种途径复苏，都没有证据表明将减少对高技能和受过良好教育者的人力资源需求。与此同时，为完成各种高等教育和培训提供机会的有利条件正在美国逐步丧失，美国过去 25 年的表现一般。此外，其他发达国家在年轻人持有高等教育学位和证书的比例方面，也正在超过美国，因此美国作为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所具有的优势已慢慢消失。当前情况下，找到一种决心和方法以最有效地使用教育资源，既是道德义务也是经济义务。

金融危机对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周木村, 林静

周木村: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目前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访学; 电子邮箱: mucunjx@163.com

林静: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管理系教授; 电子邮箱: Jinglin@umd.edu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 中国 2009 年的高校毕业生将超过 611 万, 而 2002 年的毕业生总数只有 145 万。2008 年的毕业生就业率不到 70%。面临就业的毕业生人数的日益增多, 给中国政府带来了挑战。而目前的经济危机必将造成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在 2009 年, 很可能将有 200 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其中包括很多硕士毕业生, 甚至是博士毕业生。

就业问题的成因

若干原因造成了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从 1999 年开始的大规模扩招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上世纪末, 中国的出口受到 1997 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 致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急剧下降, 而国内的内需不足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了扩大内需, 中央政府大幅降低了储蓄利率, 然而这一措施未能增加人们的开支。1999 年, 有人建议中国政府通过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来刺激内需。政府随后采纳了这项政策。2008 年继续扩招, 招生规模达 600 万, 使中国高校的在校生规模达到 2,400 万。

虽然招生规模扩大了, 但学生就业方面的考虑和保障措施却未能及时跟上。1978 年之前, 中国采取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从 1978 年开始, 中国引进市场经济体制, 敞开国门吸引外资。但是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并未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即使在今天, 几乎所有高校(除一小部分民办高校)的招生, 都是先由学校自己制定计划, 然后报各级政府批准, 通常没有进行市场需求调查。就业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 加剧了毕业生供给和用人单位需求之间差距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因此, 一方面是会计、汉语言文学、法

律和计算机等专业的毕业生太多, 另一方面是相关专业领域的就业机会有限。但与此同时, 许多公司又无法找到具有某种特定技能的合格人才。

2008 年起源于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也造成了影响。在这一全球金融危机中, 中国的经济从 2008 年夏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滑坡。在广东、浙江等中国东部省份, 数以万计的外资企业倒闭, 数百万人失业。中国的就业状况出现了衰退。2009 及随后的几年中, 面向高校毕业生的职位将会更少, 并且数量有限。比如在东华大学召开的一场招聘会上, 有超过 30,000 名的毕业生同时竞争外企提供的 1,700 个岗位。

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一些措施, 试图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危机。政府希望投入到经济中的巨额投资能创造出就业岗位, 缓解高校毕业生无法就业的巨大压力。然而一些专家预测, 基础设施建设将只能够为普通工人提供体力活, 因此高校毕业生得到的收益非常少。

政府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教育部计划硕士研究生扩招 5%, 博士研究生扩招 1.7%。由于工作机会减少, 许多毕业生选择继续读书深造。2008 年, 有 124.6 万名本科毕业生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然而, 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并不能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只能是部分缓解或推迟目前的就业压力。事实上, 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在近几年也已出现问题。

把高校毕业生送到农村是政府采取的第三种措施。然而, 城市和农村在发展水平、机会和生活条件上存在巨大差距。因此, 大

部分毕业生都选择在城市工作。为了鼓励毕业生到农村工作，政府出台了若干政策，比如在农村工作两年后的毕业生申请成为公务员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或者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享受加分待遇。但是由于农村地区的收入待遇较低，这些政策对毕业生没有吸引力。

结束语

最近，教育部一直呼吁全社会，包括海外华人华侨，为中国教育的整体改善献计献策。为了给新的毕业生提供具有创新性的教育和工作技能，以满足今后数十年的市场需求、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国家已经提出要加强创新教育和职业教育。也许这种做法是最终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根本战略，但其影响要多年后才能显现。

美国大学里的穷人与富人

John Aubrey Douglass, Gregg Thompson

John Aubrey Douglass: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同时兼任“研究型大学学生体验项目”(Student Experience in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SERU)合作首席调查员;
电子邮箱: douglass@berkeley.edu

Gregg Thomso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科研与校园调查办公室(Office of Student Research and Campus Surveys)执行主任, 同时兼任“研究型大学学生体验项目”合作首席调查员

在过去30年里, 由于许多中等收入家庭收入的减少, 美国社会经济中的流动性下降了。当然, 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有可能只是减缓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分化趋势, 尽管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已尽最大努力、做了最好的行动计划。

大量全国性的研究都指出, 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越来越难以进入美国高选择性(highly selective)的私立和公立精英大学。通常的看法是, 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学业表现和对大学的归属感上都不如富有家庭的学生, 但是并没有很好的分析与研究支撑这种观点。

对不同的大学分类研究

如果深入分析美国一组高选择性公私立大学的本科生情况, 就能发现许多微妙之处。我们的研究项目“穷人与富人(见<http://cshe.berkeley.edu/publications/publications.php?s=1>)”重点关注那些接受联邦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资助的低收入家庭的本科生(通常指家庭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学生), 结果发现这些学生不同大学的表现很不一样。另外, 我们的发现对主流观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学习经历满意度和学业成绩上比来自富有家庭的同学都差很多(至少在高选择性的大学如此), 提出了质疑。

在学费负担和入学机会问题上, 许多外国和美国的观察者总是缺乏对美国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分类研究。我们对美国32所高选择性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包括8所常春藤盟校和顶尖州立大学)中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表现进行了跟踪调查。根据一些关键指标,

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入读公立大学的机会通常比入读私立大学的机会大得多, 尽管私立大学都宣称它们会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减免大部分学费以及提供经济资助。

东海岸的常春藤盟校和西海岸的加州大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加州大学是全国最大且最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 在校本科生18万。加州大学有31%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 而常春藤盟校的比例仅为11%。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戴维斯和洛杉矶分校, 每校接受佩尔助学金资助的学生数都高于8所常春藤盟校该类学生的总和。文化、人口构成和地区差异等都是造成高选择性私立大学低收入家庭学生相对较少的原因。此外, 公立大学相对低得多的学费以及更多与成本挂钩的经济资助机会, 也促成了上述情况。

举例来讲, 加州大学招收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自人口结构多样的加州, 其中许多都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新近移民家庭。加州大学不但比其他州的精英大学更愿意招收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也十分欢迎来自社区学院的插班生, 以此作为服务加州人民的应尽义务。

相比之下, 私立大学从全国挑选学生, 几乎不接收插班生, 并且往往更倾向于招收具有某种学术特长的学生, 如标准化考试成绩优异或者具有特定经济文化背景的学生。

不少公立大学招收的低收入家庭学生相对也较少, 这与其招生区域有关。比如, 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分别只有12%、11%、8%的学生接受佩尔助学金资助)就推行了一系列私有化措施, 包括招收大量州外富裕学生, 以获得更多学费等。

新的措施

为了平息有关招收低收入家庭学生数量较少的批评,一些富有的知名私立高校最近开始对学费实行累进费率,减少低收入和部分中等收入家庭学生支付的学杂费。但这项改革看起来力度太小也太迟。

在未来几年,常春藤盟校和其他许多高选择性私立高校学生的经济状况可能不会出现太大变化。这些高校近期获得的捐赠收入大幅减少,可能导致它们提供充足的经济资助以招收更多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能力和意愿更加降低。另外,在向不富裕阶层提供入学机会方面,这些高校的影响力有限,部分原因在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大多会选择入读公立高校。例如,2006年美国最好的50所文理学院总共仅招收了0.6%接受佩尔助学金资助的学生。

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讲,也许最有效的政策不是要求高校提供资助,而是增加联邦政府提供的助学金和贷款。这样,精英型公私立高校才能吸引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随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学生数量的增加,美国政府应当重新考虑并扩大对他们的经济资助力度。美国教育部最近估计,需要接受佩尔助学金资助的学生超过预期,增加约80万人;申请该项目资助的总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16%。幸运的是,奥巴马政府正朝着正确的方向采取行动,要求在当前190亿美元佩尔助学金预算的基础上,再额外增加80亿美元,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学业表现

与家庭富裕的同学相比,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学业和其他方面的表现如何呢?为了研究该问题,我们使用了一组独特的数据,即把2006年春季在加州大学9个分校所有本科生中获得的普查数据(约57,000名学生回复)与学校自己的数据结合起来。

这个调查是“研究型大学学生体验项目”的一部分,最初由我们联合加州大学的所有分校和其他6所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的成员发起,很快又

有一些国际伙伴加入。该项目旨在收集新的有关学生的信息,以帮助高校不断改进工作,促进学术研究。了解更多有关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校园生活经历和学业表现的信息是一个重要的前沿研究领域,但现在还未完全受到美国 and 全球大多数大学的重视。

在所开展的“穷人与富人”研究中我们发现,加州大学的低收入家庭学生(我们所指的“穷人”)在学业表现上与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家庭收入在125,000美元以上的“富人”)一样好。在接受佩尔助学金资助的学生中,3/4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1/3学生的父母双亲中至少有一位具有四年制本科学历,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也是家庭中第一代接受大学教育者”这一假设。

另外,在数学、科学、工程和人文社会学科,加州大学佩尔助学金获得者的平均分积点(GPA)只略低于家庭富裕的同伴。在本科学习经历各方面满意度(包括总体满意度和所受指导的质量)以及学校归属感方面,加州大学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通常与家境较好的学生一样。

我们同时也发现,加州大学不同分校之间存在一些有趣的小差别:在低收入家庭学生比例较低的分校里,这些学生的满意度要低于家境较好的学生。拥有“一定数量”的低收入家庭学生可能对保持和促进这些学生的学业表现极为重要。因此,在低收入家庭学生数量不同的其他大学,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业表现很可能也不一样,如常春藤盟校。

虽然目前“研究型大学学生体验项目”还缺少美国其他大学的数据,但我们感觉移民人数的增加及其较高的学业表现在美国将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欧洲以及其他经济上依赖移民的开放社会,情况也将如此。

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公立高校将会继续是美国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学生主要的入读学校。事实上,由于在当前这场经济危机中许多家庭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转变将会出现,即对公立高校的需求大大增加,但这需要公立大学获得的经费足够负担新增的学生。

地区性引文索引在全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Nobuko Miyairi

汤森路透集团 (Thomson Reuters) 医疗保健与科技领域的科学与解决方案顾问

电子邮箱: nobuko.miyairi@thomsonreuters.com

1955年,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现为汤森路透集团的一部分)的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创建了“科学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他把学术论文里对参考文献的引用称作描述论文作者思想的基本单位。正如他所指出的,主题索引(subject-based indexes)这一传统方式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标引员(human indexers)无法估计到每位科学家可能采用的无限多的科学方法,而且标引员需要具备与该主题相关的专门知识。与人工索引相比,记录一篇论文中所有被引用的参考文献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因此既能克服主题索引法存在的问题,同时又能通过文献之间的适当引用维持文献的相互关系。引文索引可以作为信息检索工具,通过被引文献来追踪一段时间里特定研究主题的发展状况。

“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的第一版于1963年出版,共5卷,收录了来自613种期刊的10.2万篇文献及其140万条引用条目。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引文索引不断改进,从印刷版到缩微胶片、到CD,直至网络数据库。现如今,Web of Science收录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领域1万多种期刊,时间覆盖面已经扩展到了1900年至现在,仅2008年一年收录的文献及其引用条目就分别为160万篇和4,100万条。目前,全球共有90个国家的2,000多万用户在使用Web of Science。

用于定量分析的引文索引

虽然建立引文索引的初衷是加强科学信息的检索,但其发明人和支持者都预见到了它的更多用途,例如监测科学活动的发展及

结构,或者通过引用影响力(citation impact)来衡量某人研究的重要性。科学研究不断扩大的规模及其跨学科的本质属性,有时会妨碍科研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即使由某个领域的专家来评价也是如此。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科学的发展,获取大量的学术文献并收录其中所有的被引文献这一曾被认为是十分耗时的工作,现在已成为一项收益很不错的事业。以论文和引用计数为基础的文献计量学,作为评价国家、高校和研究人员科学研究成果的辅助工具,已被广泛运用。

地区性引文索引和全球视野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引文索引和文献计量研究才引起亚洲国家的关注。在此之前,文献计量学已被西方国家广泛用于衡量科学产出和研究绩效。由于科学情报研究所的引文索引聚焦于国际认可的“高质量”期刊,其中大部分都使用英语作为出版语言,因此亚洲学术界要求引文索引覆盖非英语文献也是一种自然反应。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的科学文献并不必然成为反对加菲尔德原来所构想的引文索引的理由。相反,引文索引实际上为所有研究人员从事各领域及其主题的研究创建了一个“起点”。

然而,当引文索引被用于科研评价时,在科学情报研究所已提供的资料之外再补充足够多的本土资料,显然成为迫切需要。特别是在那些学者们不仅使用英语而且使用其本土语言发表论文的地区,要求编本土期刊、建立自己的地区性引文索引的呼声日益高涨。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已经建立了地区性引文索引。最近,那些经常使

用英语的国家，譬如印度，也在讨论建立本国引文索引的益处。

学术研究的全球化

2005年，科学情报研究所（当时还是汤姆森科技）报道了美国在世界科学产出中份额下降的情况。这个变化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开始显现，从那时起，美国所占的份额被欧盟国家超过。亚太地区的科学产出份额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开始稳步增长。当时有人预测，按照这样的速度，到2011年亚太地区的产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美国。事实上，截至2007年，亚太地区发表的论文数占世界总数的比例已达到28.62%，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已从1981年的39.14%下降到30.95%。

多数国家的论文发表总数都在上涨，虽然各自所占的份额可能会有所波动。这种波动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且相互影响。现在

一个明显的模式就是国际科研合作的频率在不断增加，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多个作者联合发表一篇论文。

结束语

虽然地区性引文索引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土学术界进行科研评价的需求，但它们现在激起了全球的学者与本土学者合作的热情。加菲尔德的引文索引激发了许多组织开发Web of Science的新用途，扩展最初建立这个数据库时的构想。

除了引文索引在信息检索领域所发挥的转折性作用，引用计数则开创了科研绩效评价的新纪元。那些反映研究质量的指标，比如引用影响力，要比纯粹的产出数量重要得多。地区性引文索引可以揭示出哪些院校、哪些人、那些论文对推动本区域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披着校长外衣的狼

George D. Gollin

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物理系教授、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美国)董事会成员

电子邮箱: g-gollin@uiuc.edu

软件工程师在开发新的操作系统时,意识到了这些系统将会被应用在充满危险的互联网环境中;航天工程师在制造飞机时,考虑了难以预测的暴风雨和引擎故障。这些专业人士非常清楚,秉持系统整合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对待不友好环境,是任何复杂系统设计过程所不可缺少的。

然而,高等教育界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相似的专业文化:我们的组织结构可能很不成熟,无意中为不合格的学位颁发者打开了通道。我们应该向工程师们学习如何构建出一个能够承受可能攻击的体系。

有偿参与和美国医学执照考试

国际医学教育与研究促进基金会(Found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维持着美国医学执照考试(United States Medical Licensing Exam)和非美国医学院学生之间的障碍,即只有从基金会《国际医学教育名录》(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Directory)所收录的高校毕业的学生才能参加执业资格考试。该《名录》由基金会根据国家卫生部门所提供的信息编辑。但是由于缺乏核实所获信息的独立手段,因此名录内容可能与其来源信息一样不准确。

拥有圣卢克医学院(St. Luke School of Medicine)的那个美国人钻了利比里亚内战的空子,在未经利比里亚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就声称在蒙罗维亚(Monrovia)培养医学生(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2004年,利比里亚政府宣布圣卢克医学院属于非法办学。2005年,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造访了圣卢克医学院,发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该校是一个正常运作、令人放心的医学

院”。即便如此,圣卢克医学院至少2005年全年都在《名录》中,这使得该校的学生仍可以参加执照考试。

“科学、艺术与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 Arts and Technology)自称在蒙特塞拉特岛(Montserrat)提供医学教育,并炫耀拥有一个名为“伦敦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London)”的虚构机构。学校所有人持有一张由文凭工厂(diploma mill)颁发的医学博士学位,该校的“院长”同时也为圣卢克医学院工作。尽管如此,这所“大学”仍保留着它在《名录》中的位置。

《名录》饱受来源信息不可靠和调查能力不足等相关问题之苦。国际医学教育与研究促进基金会可以开发一套早期预警系统,引领下一步的行动。为了提高《名录》的准确性,也可以尝试建立一个接收主动提供的专家信息,并对其可靠性认真审核(比如“该国是否正处于内战的阵痛期内?”)的机制。

害怕诉讼

经过认证的美国高校拥有含“.edu”顶级域名的网址。科罗拉多州的EDUCAUSE是一个专注于高等教育信息化的非政府组织,该公司与美国商务部签订合同,自2001年10月起负责管理这个域名。新的“.edu”域名仅授予通过认证的高等教育机构。然而,2001年10月前授予的域名不受新法规限制,之前的登记者不需要持有认证机构的证书。在已经存在的约7,000个“.edu”域名中,有2,400个属于不符合当前资格要求的组织,其中有一个机构是消防站,还有很多是文凭工厂。圣卢克医学院的网址是www.stluke.edu,“南太平洋大学”(Southern Pacific University)的网址是www.spuni.edu,“亚当·

斯密大学”(Adam Smith University)的网址是www.adamsmith.edu,这类情况还有不少。文凭工厂有时把它们“.edu”的域名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进行宣传。2004年,名为圣瑞吉思(St. Regis)的学位工厂宣称:“一个冒牌的学院或大学根本不可能获得带有‘.EDU’后缀的网址。在授予一个‘.EDU’域名之前,域名主管机构要对院校进行彻底详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圣瑞吉思从未通过EDUCAUSE获得域名,而是使用了一个黎巴嫩的域名(saintregis.edu.lr.)。

EDUCAUSE不会审查既往那些老域名,并清除其中不符合当前标准的使用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考虑到了任务的复杂性,以及文凭工厂所有人提起诉讼后的花费。EDUCAUSE在其网站上贴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声明,解释说“.edu”域名不能证明一个机构是否具有颁发学位的权力。可耻的圣卢克医学院还保留着“.edu”域名。

如果美国商务部要求对不受新法规限制的老域名进行重新评估(或清除),或许能给EDUCAUSE提供足够的法律保护。但现在的状况无法令人满意。

法国的问题

法国的大学可以给生活经历授予学分。已有经验认证项目(Validation des Acquis de l'Expérience)被有些文凭工厂不正当使用,使其学位出售行为合法化,比如罗伯特·德·索邦大学(École Supérieure Universitaire Robert de Sorbon)和亚当·斯密大学(École Supérieure Universitaire Adam Smith)。这些臭名昭著的机构都宣称法国的法律给予了其授予学位的权力。

法国教育部制定了管理已有经验认证项目的规章,但却很少警告大众未受认可的学位提供者有可能滥用这一项目。建立一份文凭工厂的黑名单可能对解决这个问题大有帮助。

误导性的营业执照

某些国家的司法体系对于把“大学”或

“学院”等词汇用在获得营业执照的公司名称中并没有限制。文凭工厂会把这些执照展示在其网站上,误导人们这就是其学术合法性的保证。来自比利时的“康可迪亚学院与大学(Concordia College and University)”使用了美国密西西比州的营业执照。南太平洋大学用美国特拉华州的文件也达到了类似的效果。

高等教育协会中负责政府关系的工作人员,应该与立法者一起讨论如何从法律上保护“大学”和“认证”等词汇。

混入不良分子的开放名单

英国创新、大学与技能部(Department for Innovation, Universities, and Skills)一直公布经过认可的高校名单,但是该部门的网站同时也把访问者引向登有“教育与培训组织相关信息资源”的“英国知识提供机构登记处”(UK Register of Learning Providers)。登记处不进行质量认证,对上面所列机构的合法性也没有强制审核措施。

两年前,伦敦马奎斯学院(Marquess College London)宣称其作为知识提供机构,在登记处上注册。然而,马奎斯学院(现名为“伦敦圣西门学院”,St Simon's College, London)其实就是一个文凭工厂,由与罗伯特·德·索邦大学和圣瑞吉思大学有密切关系的个人所经营。马奎斯/圣西门学院通过挤进政府认可但却不受监控的名单,制造了具有合法性的假象。

国家机构允许未经认可的机构出现在他们的名单上,即使没有任何认可行为,但都为文凭工厂提供了庇护。英国的创新、大学与技能部不应该与未经审核过的高等教育机构清单有任何关系。

非政府组织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为一些未经筛选的名单和社区博客提供赞助。斯隆-C(Sloan-C)是一个在线学习社区,2005年向公众开放。圣瑞吉思的所有人立即将其6所令人讨厌的“学校”植入到斯隆-C上,并把斯隆-C的标识挂在自己的网站上。斯隆-C限制了其会员资格,让公众看不到会员名单,

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康可迪亚学院与大学 (Concordia College & University) 把触角伸进了伊利诺大学、EDUCAUSE、雪城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密西根技术大学 (Michigan Technical University)、波士顿学院和 Citadel 网站上那些没有防护的博客。康可迪亚学院与大学将其宣传资料上传到这些博客, 然后再列出这些博客的链接, 用这种方式作为其得到认可的一个指标。大部分学校一发现这个问题, 就立即采取了行动。

保持警惕

对于国际高等教育来说, 有效的质量保证是一项具有复杂性的挑战, 即使在参与者都诚实可靠的理想状态也一样。由于受到全世界每年巨额高等教育开支的诱惑, 这些披着合法学校外衣的恶狼躲藏在黑暗的角落里, 时刻等待出击。我们在制定规划时, 必须意识到这些野兽的存在。

博洛尼亚进程：疲惫不堪的跨越

Rainer Hoell, Josef Lentsch 和 Sebastian Litta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Harvard Kennedy School) 公关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rainer_hoell@ksg10.harvard.edu; josef_lentsch@ksg10.harvard.edu;
sebastian_litta@ksg10.harvard.edu

博洛尼亚进程起源于 1999 年的欧洲 29 国教育部长会议，后来又有 17 个国家加入。该计划具有雄心勃勃的目标：建立本科和硕士学位具有可比性的欧洲统一高等教育区，使学生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在各大学之间自由流动。

博洛尼亚进程的目标是值得称道的，过去十年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付出的努力也是巨大的。目前博洛尼亚进程在透明化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能力认可方面取得的进步值得表扬。然而与此同时，许多欧洲人对博洛尼亚进程感到失望，特别是像德国和奥地利这样自觉领跑的国家。本文将聚焦于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分析一下失望的原因。

实施与管理

为确保各学科和各国之间的学位具有可比性，博洛尼亚进程的目标涵盖了所有学科。然而，包括法律和医学专业在内的一些最热门专业，拒绝转到新的本科和硕士学位体系，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都是这样。在法国，大学校 (grandes écoles) 这一传统的政商精英人才培养基地，试图完全避免博洛尼亚进程。

所有参与国在 2010 年这一官方截止日期前都实现博洛尼亚进程的目标是绝对不可能的。以德国为例，35% 的大一新生仍在“旧的”学位体系中学习，比如获得人文及社会科学硕士、自然及工程技术科学硕士或者国家考试证书 (Staatsexamen)。博洛尼亚进程要求大学对其管理和课程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革，并制作大量的论文、报告和课程简介。然而许多大学非但没有得到大量额外的资金，相反却面临经费削减等经济问题。因此，

大学常常不得不在规划和评估不足的情况下设计新的框架。

自设目标的风险

上述困难可能只是事情开始时出现的问题，今后几年有可能得到解决。然而，即使是完全按照预定目标实施的博洛尼亚体制，可能也无法实现其想要的结果。比如说，至今仍无确凿的数据来明确博洛尼亚进程对学生流动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该进程的许多方面已经引起关注。

许多大学教授已显露保守主义的态度，支持传统的学位结构。为确保学生接受到的教育不比以前那些接受更长时间教育的学生少，原来 5 年制硕士课程所学习的内容，被压缩到现在新的 3 年制本科课程中。这使得学生没有时间为国外的学习做准备。

根据欧洲大学协会 (European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的一份报告，47% 的高校都指出，许多学生面临其在国外获得的学分被认可的问题。由于课程简介不相符，在一所大学学习的某门经济学课程，在其他大学可能不被认可。即使课程简介完全相符，每个国家对欧洲学分转换体系 (European Transfer Credit System) 的具体操作也使得对课程有着不同的评估，因而增加了流动的复杂性。欧洲大学协会承认，尽管 75% 左右的欧洲大学都在使用欧洲学分转换体系，但是“对该体系的不当使用或者表面化使用目前仍很普遍”。

除了学生流动的问题，博洛尼亚进程在德国曾被认为是解决高辍学率和学业时间相对较长问题的手段。这是德国高等教育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尤其

突出。然而2007年柏林自由大学所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学校不得不承认上述目标无法实现,辍学率正在攀升。以2006年为例,在新的本科学位制度下,30%就读于地理专业的学生大学二年级后退学。目前仍在实施的旧的硕士学位专业中,辍学率为6%。这与全国的整体情况是一致的。德国高等教育的辍学率已经上升到21%,本科学生的辍学率高达30%。除此之外,自博洛尼亚进程开始后,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心理咨询和抗压辅导,这也反映了该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错失良机

在21世纪,哪些资质和技能最为重要?一个22岁的大学毕业生如今应该具备什么知识?设计博洛尼亚进程时应该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然而在改革实施之前,许多参与国,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已经令人遗憾地错过了建立一种新的教育愿景的机会。

许多美国大学经常讨论这些问题,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哈佛学院课程评估委员会2004年发布的报告建议,学生应该学习融入外部世界的方法,“在国内和国际上有所作为地生活”,这与博洛尼亚进程缔造者们的想法相去不远。课程评估委员会仔细讨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而在欧洲,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都没有抓住时机来开展这样的讨论呢?

德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大危机在于,教授通常不重视本科生教育。问题在于他们有什么理由应该重视本科教育呢?教授的晋升

和终身教职完全取决于其科研表现。对教授和大学来讲,没有措施来激励他们提供良好的教学。两年前由政府出资的“卓越计划”,是根据学校的科研计划遴选出9所“卓越大学”的。由于忽视教学,博洛尼亚进程仍然被视为一种强加在经费不足高校身上的负担,而不是激励每所高校创新的措施。

行动刻不容缓

捉襟见肘的人力和学术资源已经导致“博洛尼亚疲劳症(Bologna fatigue)”。在多年来召开了无数次讨论改革的会议之后,教授、管理者和学生都已感到厌倦。博洛尼亚进程面临的一个最大危险就是该进程速度放慢甚至停止。

毫无疑问,博洛尼亚进程为欧洲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大的进步和动力,然而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扫除影响流动的障碍、解决高辍学率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体系去管理和指导学生,特别是在中学向大学的过渡阶段。如果希望学生三年后能够毕业,大学应负责提供一个组织有序且高效的入学引导阶段。为此,欧洲必须考虑本科是否需要转变成4年制。不过只有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对高等教育的目标进行了深刻讨论之后,这一转变才有意义。对每一个欧洲的大学来讲,开展一场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Derek Bok)所谓的“伟大的课程讨论”已刻不容缓。

波兰国际化中的问题

Bianka Siwinska

波兰《远景报》(Perspektywy)主编

电子邮箱: b.siwinska@perspektywy.pl

经合组织2007年的报告《波兰高等教育回顾》(Review of Tertiary Education in Poland)以相当坦率的语言对波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情况作了总结:“在波兰,没有国家政策鼓励旨在国际化的行动……[并且]没有任何为了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所需要的明确的法律文件……国际化的范围非常有限”。

正如报告所明确的,波兰国际化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连贯性的国家策略。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参与程度非常有限。为了使波兰的高等教育更加国际化,高校在自己努力或与特定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这种自下而上的措施显然已不再足以促进国际化进程。

波兰的高等教育已经因此遇到麻烦。波兰仅有13,695名留学生,占200万大学生的0.71%(其中3,989人来自乌克兰、1,805人来自白俄罗斯、1,039人来自挪威、749人来自美国、354人来自中国),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留学生人数最少的国家之一。在伊拉斯莫斯(Erasmus)这一欧洲学生交换项目中,出国的波兰学生与来波兰学习的学生比例为3:1。

人口规模只有波兰1/4(约1,000万人)、在其他方面与波兰也具有可比性的捷克,不仅在留学生比例方面,而且在绝对数方面,都领先于波兰。捷克的留学生人数为26,000名,约占其大学生总数的8%。在伊拉斯莫斯项目中,出国的捷克学生与到捷克学习的学生比例为3:2。

发展是关键

在波兰,某些趋势不利于高校吸引外国留学生:只有数量有限的优秀教育项目采用英语授课;波兰缺乏世界一流的学术卓越中心——其最好的两所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的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仅位居400名左右;经合组织的报告认为,波兰的高校“没有吸引留学生的策略,也没有制定适合国际市场营销的积极政策”。

在德国,在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这是一个拥有3亿欧元年度预算的组织。英国和法国也有致力于国际教育的机构,分别是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和法国教育服务中心(CampusFrance)。在波兰,唯一一个具有类似功能的组织是非政府组织——远景教育基金(Perspektywy Education Foundation)。该基金没有得到任何的公共资金,完全依靠来自大学的支持运营。波兰政府似乎未能充分理解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性。

博洛尼亚进程

自从波兰2004成为欧盟成员国之后,来自外部的改革压力增加了。博洛尼亚进程从1999年就已开始实施,波兰是签署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博洛尼亚公约的国家之一。博洛尼亚进程最重要的政策包括引入本科—硕士—博士的三级学位制度、建立欧洲学分转换体系、实施人员流动项目。

为了适应新的国际要求,波兰的高等教育开始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基于欧洲的学术人员培养项目,有关大学国际化的专门知识正在增加。波兰高校正日益积极地参与国际化。

转折点

在波兰,政府向大学拨款的原则已经改革,其中包括一项促进国际化的因素。因此,大学开始把国际化纳入学校的议程。这一做

法远景教育基金会早已实施，其波兰大学排名中就包括国际化指标。目前，国际化水平在大学排名中所占的比重约为10%。

2005年5月，波兰大学校长会议（Conference of Rectors of Academic Schools）和远景教育基金会共同建立了旨在加强波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留学波兰项目”（Study in Poland），并创建了包括40所对国际化感兴趣的最好大学在内的联盟。该项目负责组织会议、开展专业性研讨会、出版留学指南以及重要教育市场的信息。“留学波兰项目”已经在中国、印度、越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美国，以及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开展了留学推介活动。自该项目实施以来，波兰高校的外国留学生数量增加了30%。

波兰目前的执政党——公民纲领党（Platforma Obywatelska）在2007年竞选时曾宣布支持波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留学波兰项目”。虽然目前尚未采取任何措施，但有关人士正在努力劝说。

未来的发展

波兰大学校长会议已经确认，为了实现真正的国际化，波兰高校需要启动跨国教育、制定吸引外国留学生和学术人员的政策以及开发国际化课程。如果不能更好地理解国际高等教育的图景，波兰高校被边缘化的过程仍将继续。由于波兰公立高等教育体系的集权性，需要投入资金以确保国际化进程。

双学位和联合学位项目：双重收益还是重复计算？

Jane Knight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兼职教授

电子邮箱: janeknight@sympatico.ca

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中，国际合作的双学位、联合学位和复合学位项目（Combined Degree Programs）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数量和影响力在未来几年都将继续扩大。这一国际化战略为个人、高校、国家与地区的教育都带来了重大收益。人们对这些项目的兴趣正在增加，但对这些项目的特点及要求的困惑也在上升。

对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双学位和联合学位作为交换和流动的自然延伸而受到欢迎。而其他人士则认为这些项目是一种棘手的新生事物，会导致学术工作的重复计算，较易引起学术欺诈。由于这些项目在模式上的多样性、参与高校类型的不同、质量保证和培养结果的不确定、以及采用何种标准设计授予这些学位所需的学习工作量或新的能力要求等问题，致使人们对这些项目的看法多种多样。

概念界定

用于称呼这些国际学位合作项目的语词众多，包括双（double）、多（multiple）、三国（trination）、联合（joint）、整合（integrated）、合作（collaborative）、复合（combined）、协作（concurrent）、连续（consecutive）、重叠（overlapping）、联合（conjoint）、并行（parallel）、同步（simultaneous）、共同（common）等。这么多的词语，表明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情况变得复杂。下面这些定义所提供的可能是清晰且普遍的看法：联合学位（joint-degree）项目指完成合作高校共建项目的要求后，授予一个联合的学历证书。双学位（double-degree）项目指完成两所合作高校共建项目的要求

后，授予两个单独的学历证书。复合学位项目指完成合作高校的要求后，授予两个不同的、具有连贯性的学历证书。

有利之处

学位合作项目能比许多国际化策略带来更深入、更可持续的关系，带来课程创新、教师和研究人员交换、接触专业知识和科研网络的机会增加等学术利益。学生受到双学位项目的吸引，则是由于它能增加就业机会、体验国际学习和生活，以及“一个项目、两个学位”（two degrees for one）意味着学习工作量和学费减少的认知。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学位合作项目则被认为有利于提高地位和竞争力，促进能力建设。

带来的挑战

学位合作项目能带来多方面的收益，但问题同样也不少。由于管理体制、教学安排、学分体系、学费和奖学金制度、教学语言和方法、考试要求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合作高校只能符合部分技术要求。

各国与各高校之间规章制度和习惯的不同，对国际合作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带来了挑战，比如阻碍学生同时在一所以上高校注册的规章制度、要求学生最后一年或学期留在派出高校的法规、招收和选拔学生的做法等。对在合作高校所学课程、所得学分的不认可和限制，造成了额外的障碍。学年安排的不同，为学生流动带来了问题，但为教师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评估要求和程序往往也给学位合作项目造成许多困难。

质量保证和认证是最为基本的，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国家层面的认证制度；或者即使有，也差异巨大。有些认证是专业认证，

有些则是学校整体认证。许多认证关注投入，而有些则关注过程或产出。目前，最好的情况是合作的各方都得到了认证。特定的专业教育项目由国际认证机构认证，如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EQUIS），但目前高校可能更多地是让自己本校的教育项目而非合作项目接受认证。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地区或国际认证对国际合作项目来说，是否是最佳途径。

对各种合作项目学历证书的认可是最伤脑筋的问题。目前只有很少的国家（虽然数量在不断增加）从法律上允许本国的高校与外国高校合作，颁发联合文凭。学生可能从一所大学获得一个正式的文凭，从另一所大学得到一个非官方的证书或其他证明，以表明这是一个合作项目。对有些学生来讲，最重要的是合作项目的国际化性质，而非其文凭；但对其他很多学生来讲，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对他们本人及其职业生涯来说，文凭的重要性都越来越强。

雇主、学术机构和学历评估机构必须意识到在双学历或多学历的授予和认可中存在的问题。人们认为有些双学位、多学位和复合学位更具“合法性”，但这种印象很难用事实证明。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担心同一课程的学分和学习工作量在两个或更多学历中被重复计算。这也导致双学位项目被贴上“付出

一份，得到两份”（two for the cost of one）的标签。这里的付出不仅仅指经济上的花费，而且还包括学生的学习工作量。

确定国际合作项目毕业要求的模式多种多样，这也带来了问题。毕业要求的确定是根据课程和学分的完成数量、学生的学习工作量还是根据达到规定的学习效果和能力，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在合作项目所授的两个或多个学位的合法性问题上，这三种方式将导致不同的解释和争论。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不同国家的两所或多所高校用同一学习工作量授予两个或多个学位，降低了学历证书的有效性。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学生达到了规定的学习效果和能力，那么这个学历证书就具有合法性。这种逻辑意味着，基于一系列核心课程或能力而颁发的两个或多个学位，在学术上是具有合法性的，因此需要加倍注意的是认可这些学历的过程，而不是所规定的学术授予要求本身。这两种观点都具有合理性，但是国际合作项目模式的多样性妨碍了合法性问题的彻底解决。

高等教育界必须对双学位、联合学位和复合学位项目形成一种共识，消除这些项目在不同国家的制度框架、文化和实际操作中面临的学术障碍。为让全世界的学生、高校和雇主重视和认可国际合作项目及其所授予的学位，需要对相关的认证、认可和学历合法性问题进行认真探讨。

美国的留学生：2007/08 学年的门户开放调查报告

Patricia Chow, Rachel Marcus

Patricia Chow: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高级项目主管

Rachel Marcus: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研究员

电子邮箱: iieresearch@iie.org

2007/2008 学年, 美国的留学生数量创记录地达到 623,805 人, 比前一年增长了 7%, 是自 2001/02 学年以来的首次显著增加。在衡量学生人数增加方面, 美国高校入学新生数量比总的学生数量更为灵敏, 07/08 学年的入学新生增加了 10%, 达到 173,121 人。国际教育协会自 1954 年开始, 每年以门户开放项目 (Open Doors project) 对美国 3,000 所接受认证的高校进行国际教育交流方面的调查, 收集有关美国高等教育留学生的数据。

2007/08 学年留学生的来源

在美国, 印度连续 8 年都是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 2007/08 学年印度学生的数量为 94,563 人。中国大陆今年仍是美国留学生的第二大来源国, 留学生数为 81,127 人。韩国位居第三, 留学生数为 69,124 人。2007/08 学年, 来自这 3 个国家的留学生规模都有大幅度增加, 亚洲另外两个留学生来源大国——越南和尼泊尔的情况也一样。来自亚洲的留学生数量 2007/08 学年共增长 10%, 占所有留学生总数的 61%。来自中东地区的学生数量 2007/08 学年也增加了 11%, 主要是由于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学生大规模增加 (增加了 25%, 得益于沙特政府 2005 年实施的奖学金计划)。尽管来自墨西哥的留学生人数上涨了 7%, 但来自拉丁美洲的留学生数量整体略微下滑, 降幅接近 1%。来自非洲的留学生数量也出现了不到 1% 的小幅下滑。继 2006/07 学年下滑之后, 2007/08 学年来自欧洲和大洋洲的留学生数量都出现了小幅增加。虽然来自欧洲的留学生数量还远低于高峰期 2001/02 学年的 95,697 人, 但这是自 “9/11 事件” 之后的首次增加。

2007/08 学年留学生的概况

2007/08 学年, 美国留学生中的研究生多于本科生, 自 2001/02 学年以来一直如此。在留学生中, 49% 为攻读学位的研究生, 43% 为攻读学位的本科生, 8% 为不攻读学位的学生。不攻读学位的学生数量在过去的一年上升了 12%, 主要是来自中国、印度和越南的这类学生大幅增加。

几乎 2/3 (62%) 的留学生都是自费生, 其中 82.5% 的本科生、77% 不攻读学位的学生都是由个人及其家庭支付学费的。就研究生层次的留学生而言, 约一半人 (46%) 是自费生。

在美国的留学生中, 1/5 正在攻读商业和管理这一最受留学生欢迎的专业。自然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专业也非常受欢迎, 约有 40% 的留学生攻读这些专业。

自 2001/02 学年以来的变化

“9/11 事件” 之后, 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数量出现了几乎连续 50 年增加后的首次下降。虽然留学生的总数现在已经回升, 但是留学生的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一些例外情况, 总体趋势是来自留学生最大输出国的留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 (现在已超过 “9/11” 之前的水平), 而许多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和亚洲之外的国家则呈下降趋势。

虽然美国的留学生总数自 2001/02 学年以来增加了 7%, 但从亚洲来的留学生数同期增长了 17%。这主要是由于来自印度、中国、韩国、尼泊尔和越南的留学生大幅增加, 其增加的数量完全掩盖了亚洲其他主要留学生

来源国留学生的大幅下降,其中包括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

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留学生情况也类似。与2001/02学年相比,2007/08学年来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留学生数量平均下降了15.5%。然而,若干个穆斯林国家的留学生数量却上升了,最明显的是沙特阿拉伯,其学生数量虽然在2001/02~2004/05学年间下降了46%,但2001/02~2007/08学年之间增长了77%。北非也呈现类似趋势:虽然2001/02~2006/07学年间下降了31%,但是2007/08学年增长了4%,是自2001/02学年来的首次增加。

2001/02~2007/08学年间,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数大多出现了轻微下降:来自非洲的留学生数下降了5.5%,来自欧洲的下降了12%(尽管2007/08学年增长了1.5%),来自拉丁美洲的下降了6%。北美地区(包括加拿大和百慕达地区)和大洋洲的留学生数同期分别增加了9%和3%。

自1981/82学年以来的变化

1981/82~2007/08学年间,美国的留学生数几乎翻了一倍,从326,299增长到623,805

人。在此期间,留学生中的本科生人数上升了25%,而研究生人数则上升了160.5%,因此本科生在留学生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

就美国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来看,1981/82学年最大的留学生群体来自伊朗,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台湾和尼日利亚,来自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数共占当时美国留学生总数的23%。自那以来,不仅美国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发生了改变,而且从这些国家来的留学生数也出现了明显增加,2007/08学年来自前三大留学生来源国的学生数已占留学生总数的39%。

结论

虽然美国的留学生数量自1981/82年来有了大幅增长,但与以往相比,留学生来源地和所学专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是由于留学生来源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全世界高等教育版图的变化,为学生的国际流动既创造了机会,又产生了阻碍。

作者注:“门户开放项目”自1972年就得到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的支持。本文所表达的都是作者自己的观点。

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关键地位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非常强调经济的重要性，其竞选口号“笨蛋，关键是经济”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应该说“笨蛋，关键是教师”。事实上，如果没有一支敬业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任何大学都不可能获得成功。没有大师，无论是宏伟的校园还是创新性课程，都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全世界的高等教育都注重大楼、实验室等“硬件”，而忽视了“软件”，即那些真正让学校获得成功的人才。看看那些经常受到批评的排名，它们衡量的内容是什么？主要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教师的科研成果和经费、学生的质量，学校的预算和设施在排名中不太重要。

在忙于应对学生人数日益增加和经济状况恶化的过程中，教师几乎都处在被遗忘的角落。如果高等教育要取得成功，“关键是教师”就必须成为全世界高校的核心价值取向。

审视一下全世界高校教师的地位，虽然结果令人沮丧，但却非常必要。有若干事例可以反映全球的现实情况。其一，许多国家的高校教师正在经历老龄化，一半或者更多的高校教师已接近退休年龄。在许多国家，新培养的博士毕业生太少，无法填补这些即将空缺的岗位，而且许多新的博士更愿意从事学术界之外的工作。对于博士阶段学习的激励措施太少以及毕业后就业市场的不确定，再加上很多学科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妨碍了博士生的招生，并造成许多博士生辍学。那些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国家所遭受的打击尤为沉重。以越南为例，每年需要新增12,000多名高校教师来满足发展目标，但目前仅有10%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

兼职教师的增加

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教师需要全身心

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之中。他们必须是全职聘用，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学术责任和聘用他们的高校中去。全职教师职位正在大幅减少。拉丁美洲是“出租车型”兼职教师的发源地，这些教师同时从事教学工作和其他工作，或者在不同学校之间奔走。除了巴西，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高达80%的教师都是兼职聘用。由于学校支付的报酬微薄，他们对学校或学生几乎没有奉献精神。因此，全球500强高校中几乎没有拉丁美洲的大学不足为奇。在美国，新聘用的高校教师中仅有一半属于全职的“终身教职”系列，即那种有望在高等教育中拥有职业生涯的教职。其余都是兼职的“应急型”教师，待遇差、福利少。作为高校保证人员编制灵活性的一种方式，新出现的全职合同制教师近年来不断增加。传统的终身制教师在层次较高的高校中较为常见，因此导致整个学术系统越来越不平等。

在许多国家，高校会聘用那些在其他学校具有全职岗位的兼职教师，大部分东欧国家、中国、越南、乌干达等都存在这种情况。教师的薪酬非常低，高校期望教师赚取外快来补充自己的收入，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补贴学校。在中国，有些高校期望教师从事咨询或其他校外工作，作为其学术职责的一部分。有些高校则另外建立授予学位的“独立学院”，教师在这些学院从事额外的教学工作，以同时提高学校和教师的收入。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公立高校的教师通过兼职促进了私立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

全职教师岗位的减少正在对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造成危害。如果教师们不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维护学术文化、课后与学生一起工作、参与学校治理，学术质量将会下降。这正是英国谚语所说的“因小失大”。

学历的低端化

在全世界的高校教师中,可能一半人只有学士学位。没人知道确切的情况,但我们所知道的是,高校教师正快速增加,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还没有跟上,鼓励最优秀的人才加入教师队伍的薪酬待遇也没有跟上。在中国这一全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只有9%的高校教师拥有博士学位(虽然这一比例在顶尖研究型大学为70%左右)。在印度,35%的高校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在许多国家,相当一部分的高校教师只具有本科学位,有些甚至连这一最基本的学位都没有。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有顶尖大学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比例通常不到10%。在全世界,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规模都已被定为最优先的事项,但由于对基本的高等教育的需求过于庞大,因此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速度缓慢。

贫困化

现在的情况是,已经很难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学术界来了。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费,高校教师的薪酬未能跟上受过高级训练的专业人士的报酬。根据我们最近对15个国家高校教师薪酬的一项调查显示,全职教师可以依靠其薪酬生活,但他们的收入并不比本国的平均收入高很多。在最有资质的年轻人中,仅有相当少的一部分为从事学术职业而在顶尖大学接受严格的教育。训练有素的人经常跳至其他行业收入较高的工作中,或者从发展中国家跳至欧美从事教师或其他工作。

官僚化

在以前,即使高校教师的收入待遇不好,但他们还拥有大量的自主权,能够对其教学、科研和个人时间自我控制。但在许多学术系统和高校,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改变。由于问责制和评估,教师们失去了大量的自主权。评估工作和其他问责措施,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各种学术成果都被评估之后,给教师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即使许多成果实际上难以或不可能精确评估,但还是要接受评估。许多人批评英国的科研水平

评估,认为其许多做法扭曲了学术工作。

由于高校的发展以及对外部当局承担了更多的绩效责任,学校比以前更官僚化。沉重的官僚化控制对教师的能力及其参与学术管理的传统都是有害的。教授的权力曾经占主导地位,有时还被用来抵制改革,但在这个问责和官僚主义的时代,这种权力变小了。

下一步的行动

找到恢复学术职业并因此使高等教育取得成功的方法并不难。学术职业必须再次成为一种职业,具有适当的训练、报酬和地位。这意味着硕士和博士生的培养规模必须大幅度扩大;聘用兼职教师的热潮必须停止,代之以足够的、具有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的全职教师岗位;提供给教师们的薪酬也必须足以吸引并留住优秀的年轻学者。

在一个分层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以科研为重,虽然科研是获得威望和地位的金科玉律。大部分的教师主要从事教学,他们的工作量应该反映出这一点。高校教师享有不加约束的自主权以及极少评估的年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然而,问责制和评估可以以适合学术工作的方式进行,而不是进行惩罚。

对于学术职业,如果说还有什么好消息的话,那就是更多的高校教师喜欢其现在的工作,忠诚于这个职业。卡内基基金会1992年开展的一项有关学术职业的国际调查发现,对学术职业的满意度惊人得高;2007年“变革中的学术职业”(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这一全球调查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尽管存在问题,但学术职业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目前的挑战在于,如何确保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再次把教师看作是高等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目前的环境中,大众媒体以及一些高校管理者、政府官员倾向于认为高校教师是学术界问题产生的根源。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教师才是高等教育取得空前成功的根本。学术职业确有改进的空间,但抨击它既不会带来改革,也不会提高学术产出。

学术职业：哥伦比亚 2019 年的愿景

Iván F. Pacheco

哥伦比亚教育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主管

电子邮箱: ivan.pacheco.1@bc.edu

知识经济的出现给那些必须努力进入高度竞争的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哥伦比亚的情况就是如此。哥伦比亚政府的新规划聚焦于 2019 年，即哥伦比亚独立 200 周年之际。政策制定者们关注国家如何走向知识经济，以及科研人员和高级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然而，哥伦比亚学术人力资本的现状为上述目标的实现提出了挑战。哥伦比亚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没有足够的高水平研究人员，其部分原因在于国家缺乏吸引并留住优秀学者的条件。

哥伦比亚教师的薪酬在全世界没有竞争力，这在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最近开展的一项调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被调查的 16 个国家中，哥伦比亚位居薪酬最低的 4 个国家之列。此外，政府也没有成功地开发出弥补经济收入有限的其他激励措施，比如提供条件良好的实验室、支撑性的学术共同体和稳定的工作。虽然少数官方文件讨论了吸引外国学者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深入分析留住本土教师、吸引国外人才的薪酬待遇和其他机制。哥伦比亚高校教师聘用和给付薪酬的现实情形迫切要求对聘用机制和薪酬结构进行改革。

公立和私立高校的薪酬待遇

高校的性质（公立还是私立）或许是解释哥伦比亚教师如何获得报酬的最相关因素。在全国 272 所高校中，仅 81 所是公立高校，但其学生规模却占全国的 50%。

公立高校的全职和兼职教师被看作是公务员，由特殊法律管辖。然而私立高校的教师由适用于其他所有劳动者的一般劳动法管辖。

为作为公务员进入教师队伍，每位候选

人都必须参加能力考查程序，就所学课程、学术成果等接受评估。该过程还包括一段见习期。候选人一旦正式进入教师队伍，其教职就是终身的，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与国内其他公务员非常相似。薪酬则根据中央政府确定的一套方法计算，几乎没有协商的余地。

在公立高校，有两类教师不算公务员：一种是非定期聘用的教师（occasional teachers），另一种是按照小时聘用的教师（profesores de hora cátedra）。这两类教师在法律上被作为例外情况，通常被称为“临时教师”，在公立高校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 2005 年就占全国高校教师的 64%，而全职教师的比例仅为 25%。

私立高校的教师通常没有终身教职，大部分都是通过签订期限不超过一年的合同聘用的。这些合同往往会续签，但学校可以在没有通知当事人或不支付遣散费的情况下决定不再续签合同。像公立高校一样，私立高校的教师也可以按小时聘用，兼职或全职的都有；其他类型的教师也有，但不常见。在薪酬方面，私立高校与教师们协商的灵活性大一些。由于这个以及其他原因，有关私立高校薪酬的信息非常有限，难以进行研究。

成为高校教师的资格

在公立高校，成为教授的最低要求是具有学士学位。然而，偶尔也会聘用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在私立高校，对教师应该具有的最低学位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教师一般至少具有学士学位。在工业院校和艺术专业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在哥伦比亚的高校教师中，2005 年有 1.86% 的人学历低于本科；36.7% 的人具有本科学历；61% 具有研究生学历，其中 3.3% 具有博士学位。

展望 2019

哥伦比亚的发展规划涉及作为大部分部门重要组成部分的科研与知识的生产和应用。教育部门 2019 年战略规划确定的一个目标是至少 30% 的全职教师具有博士学位，而目前的比例只有 8%。

哥伦比亚将在公立高校创建灵活的环境、提高公私立高校教师职业的稳定性并要求科研人员以提高竞争力为目标。薪酬低、工作环境不稳定以及学术环境薄弱导致未能

将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学术界来。

现在距离 2019 年只有 10 年的时间了，哥伦比亚应该评估一下是否将引进国外人才来提高自己的科研实力。鉴于薪酬待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哥伦比亚应评估一下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是否方便、可行，以便吸引那些有能力把 2019 规划向前推进的国内外人才。教师的报酬应根据国家的发展愿景来决定，而不是仅仅取决于国家的财力。

中国民办高校的问题

Osman Ozturgut

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教育学院教师

电子邮箱: osmanhoca@hotmail.com

经中央政府许可, 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省份都开始出现民办高校。如果接受教育被看作是主要的目标, 那么认为这些民办学院正在提供机遇的说法似乎是公平的, 因为它们接受那些高考成绩比较低的学生, 满足了中国对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巨大需求。然而, 当讨论到教育质量(包括设施设备、教师和管理人员)时, 人们则担心民办高校的办学效果可能不如中国二流的公立高校。

中国确实有办学很成功的民办高校(参见 Jing Lin 和 Ruth Hayhoe 撰写的“中国的民办高校: 一个成功案例的研究”, 国际高等教育, 第 51 期), 为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然而, 这些学校可能是特例, 中国目前有许多不那么成功的民办高校。本文决不打算损毁那些优秀民办高校的教学与管理, 而是试图为讨论中国民办高校的未来提供一个起点。

教师与管理人員

民办高校的教師主要由本科畢業、缺乏教學經驗的年輕人組成。他們一周的教學量為 16~20 個小時, 由於缺少科研和專業發展機會, 剩下的時間他們就是與其他同事聊天。這些教師通常只在民办高校待 1~2 個學期, 然後轉到公立高校開始其“真正的”工作。在民办高校, 他們的待遇一般為每月 2,500 元(約合 350 美元), 以及校內一套小型公寓房。雖然公立高校付給這些教師的工資與民办高校差不多, 但公立高校為教師提供職業保障, 並帶來聲譽和威望。

民办高校的管理高层主要包括那些来自商界且具有大胆营销经验的人士。一学年中副校长可能会更换 3~4 人。级别较低的管理人員也经常換崗, 或被調到不同的院系。

黨組織負責人(Party representatives)被安排在副校長的位置, 其他的高層管理崗位則是聘用親戚。這些管理者只有很少或者沒有教育經驗, 他們認為民办高校是有利可圖的企業。如中國南方一所比較有名的民办高校, 聘請了一位前任書記擔任常務副校長, 校長的兄弟姐妹、子女和堂/表兄妹則被安排在極其重要的職位。

住宿與學習條件

民办高校為那些每年支付 12,000 元人民幣(約合 1,750 美元)學費的學生提供的設施與公立高校差不多。學生的住宿條件中等, 6 人一間宿舍, 每人除了一套桌椅外沒有其他家具, 熱水一天供應兩個小時, 沒有電視機, 網絡速度很慢(中國的普遍情況)且通網時間有限。學生食堂、雜貨店和開水服務通常由學校的所有者擁有並經營, 對於應該吃什麼以及付多少錢, 學生沒有其他選擇。學校可能不允許學生在校園內使用現金, 必須使用學校發放的消費卡, 每次充值至少 50 元。這樣的做法除了其他好處外, 當然也為了方便和安全; 但對卡里沒有用完的錢缺乏退款機制, 是一種相當霸道的商業行為。此外, 學生使用網絡、熱水和電需另外付費, 其費用甚至需要預先支付, 而且也沒有退款機制, 有時候電費比供電局向學校徵收的標準高 3~4 倍。民办高校大多不在市區, 由於公共交通不方便, 學生沒有其他辦法出行, 只能呆在學校里。

那些因高考成績不好而被社會拋棄的中國學生謙卑而絕望, 他們仍舊願意支付高額的費用, 住在普普通通的宿舍, 在沒有空調的教室裡(夏天酷熱、冬天極冷)聽那些毫無動力和經驗的年輕教師講課。應該指出的

是，民办高校提供给学生的住宿条件与公立高校一样，但公立高校的收费不到民办高校的一半。学校在收取了昂贵的学杂费后，除了提供全面且有竞争力的教育外，当然还应该保证更好的住宿和学习条件。

结束语

民办高校的声音相对较低，因此公众对其毕业生并不看好，这导致社会把民办高校的学生看作是无处可去的无能者。在招生会场，招生人员完全根据学生家长是否满意做出承诺，而忽视了这些学生的需求。没有人倾听这些学生的想法，他们也不能抱怨，因为他们丢了家人的脸面、让家人感到失望。各种聊天室虽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诉说自己想法的平台，但是对于推进中国民办高校的改变微不足道。

这些学生支付了高额的学费，理应获得更好的教育与待遇。中国的民办高校不应该利用这些学生的绝望，而应看到来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其他民办高校的激烈竞争。本文所使用的案例基于我在中国4所不同民办高校的教学经历，每所学校的学生规模都在20,000人左右。其中一所高校最近被评为“中国十大民办教育机构”。这些民办高校应该着手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和服务，使其毕业生在社会中更有竞争力。

如果有教育总比没教育好的话，这些有问题的民办高校对中国来说也是有价值的。然而，由于中国需要更多的高校，低层次的民办高校应开始把重点放在为那些支付了高额学费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良好的住宿条件上。

进一步探析经合组织的高等教育统计数据

Arthur M. Hauptman

公共政策领域的独立顾问，主要从事高等教育财政问题研究

电子邮件: art.hauptman@yahoo.com

经合组织每年在《各国教育概观》(Education at a Glance)上定期公布的有关各成员国高等教育的统计数据，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比较其成员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表现。但是，与这些关键指标的计算和公布方式有关的许多问题，限制了这些数据在国际比较中的效用。《各国教育概观》中的许多数据要么不正确，要么具有误导作用。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对经合组织定期收集和公布的不少数据进行一番认真的审视，包括：入学率(enrollment ratios)、完学率(persistence rates)、入学与学位获得率(attainment rates)之间的脱节、生均经费(spending per student figures)以及财政承担额(financial commitment, 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占GDP的比重)等。

入学率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participation rate)通常被用来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国际比较。马丁·特罗(Martin Trow)30多年前就使用这一概念，将高等教育体系划分为精英型、大众化和普及化三种类型。经合组织计算入学率——经合组织版本毛入学率的方法是用在校生总数除以传统的大学适龄人口总数。这种计算方法所带来的若干问题，限制了入学率在衡量高等教育参与情况时的效用。

经合组织计算入学率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分子里包括了超龄学生和留学生，但分母中却不包括这些学生。这造成拥有大量超龄学生和留学生国家的高等教育参与度被夸大。因此，经合组织计算出来的某些国家的入学率可能偶尔等于、甚至高于100%。

此外，由于数据收集方面的局限，经合

组织报告中的高校在校生数常常不能完全包括实际上接受高等教育的所有学生。例如，美国大部分进入职业学院的学生未被计入经合组织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数中。加拿大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联邦统计数据不包括省立社区学院所有的在校生数，因此许多社区学院的学生并未被计入经合组织的数字之中。在某些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一部分或所有接受继续教育的学生都不被算作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在于，仅计算当前的在校生数并不能反映已经完成高等教育的人数情况。例如，一个22岁就完成本科教育、而当前年龄为23岁的人，是不包括在目前对18~24岁在校生的统计中的。但显然，任何对高等教育参与度的合理测量，都应该包括这些学生。

完学率

经合组织公布两种类型的完学率——完成率(completion rate)和毕业率(graduation rate)。完成率就是把一年内授予的学位除以往某一学年入学的学生数。另一种经合组织公布的完学率——毕业率，是把一年内的毕业生数除以常规毕业年龄的学生数。

与入学率类似，两种完学率都是对真实情况的近似反映，因为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并不跟踪一个群体中完成高等教育的学生数目，虽然经合组织一直在尽力从其成员国那儿收集相关数据。与入学率的情况相同，经合组织公布的完学率的近似本质，意味着它们并没有测量其所期望测量的数据。这可能让人对一个国家到底排名第几名很迷惑。以新西兰为例，其完成率几乎在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垫底，仅仅高于匈牙利、美国和意

大利，低于墨西哥。但是在毕业率方面，新西兰则成为了领先者，在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第三。

入学与学位获得率的脱节

越来越依赖经合组织公布的学位获得率来进行国际比较，是一个十分积极的进步，因为各国数据往往通过劳动力调查连续收集，能同时反映入学情况和毕业情况。然而，对经合组织的入学和学位获得数据进行研究之后，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一致。虽然加拿大的副学士学位(subbachelor's degrees)获得率是最高的，但是根据公布出来的招生数，根本得不出经合组织所公布的学位获得率。造成这种不一致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数据来源不同：招生数来源于高校上报的数据，而学位获得数来自于对劳动者进行的最高学位调查。

生均经费

虽然已经尽力除去非教育开支，但经合组织公布的教育开支中经常包括用于非教育活动的经费。例如，经合组织报道的美国2005年的生均教育经费为1.8万美元，但最近几个美国报道公布的包括公立和私立高校在内的美国生均教育经费约为1.4万美元。经合组织的数据还可能忽视文化差异。例如，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许多在校生并不定期上课。这对大学的财政来说可能是一种恩赐，但并不有利于教育质量。

科研是经合组织公布的生均经费里的另一项重要组成。问题在于，像经合组织那样计算出的生均科研经费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处于精英阶段，那么其生均科研经费可能就比较低，而处于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体系，生均科研经费可能就比较低。但这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一个国家对科研的支持情况。考虑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要明智得多，许多文献(包括经合组织)在测量国家对研发的支撑力度时就是这么做的。

财政承担额

除了测量生均教育经费，经合组织还公布各国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占GDP的比重。正如前文讨论科研经费所讲的，用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份额来衡量其财政承担额，比用生均经费更合适。但与教育支出统计中的问题一样，经合组织计算某些国家的财政承担额数据时，包含了其他一些国家未统计上报的数据。还是以美国为例：在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美国的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是最多的，远多于其他国家。但美国领先的原因在于其私人资源投入很高，包括大学附属医院的收入和捐赠收入，许多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数据中不包括这部分收入。事实上，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支持非常一般，在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位居第15名。

对经合组织在高等教育方面发布的若干关键统计数据的审视表明，在使用这些数据比较不同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时，要十分小心。同时这些实例也说明我们需要开发出更好的测量方法，以便更好地对比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一些关键差异。

国际比较中存在的问题

Clifford Adelman

美国华盛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cadelman@ihep.org

对于美国的高等教育,有许多负面报道,即使是取得公认进步的方面,这些报道也会说“不要高兴得太早!其他国家做得比我们好!”,并且提供了一连串经合组织的人口比例(population ratios),表明无论是毛入学率还是学位获得率等受到争议的指标,美国都分别从第2、第3名跌落到第9名或第15名。

上述做法在任何国家都不新奇。这样的报道,是不是想唤醒地方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告诉他们有人正在退步,而那个人就是我们美国人。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各国的教育者,无论所在国家大小,都喜欢不停地自我苛责。在进行国际经济对比时,我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贸易平衡、GDP和货币汇率等指标。

经合组织的这些人口比例除了在高等教育领域,在其他任何领域都不适用,我们使用这些数据不但不会有效果,而且会产生误导作用。对后工业化国家来说,高等教育领域最有名的报告都使用经合组织每年出版的《各国教育概观》中公布的数据,并把这些数据看作是进行判断的金科玉律。经合组织的数据,特别是有关25~34岁年龄群体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保持率方面的数据,对那些过分批判现实而故意忽视一些最基本事实的教育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正中其下怀。在此,我力劝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同行们,千万不要掉入这个陷阱。

要发现经合组织人口比例中的问题,都不需要高于小学四年级的数学水平。所有使用经合组织数据的报告,无一考虑美国人口的相对规模或者其3.1亿人口在种族、民族、出生地、宗教和母语方面的多样性。撰写那些报告的人很轻率地把我们美国的教育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比如说丹麦这个人口仅为

540万、其中91%都是丹麦人、82%属于一个教派的国家。那些人会称赞芬兰的高等教育,但芬兰是一个种族和语言(虽然使用芬兰语和瑞典语这两种语言)同质化的国家,其总人口仅500万,人口增长率只有0.1%,而移民净流入率为1%(主要来自东欧国家)。芬兰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新建11所多科性院校(AMKs)将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了1/3(美国若要达到同样的效果,需新建600所4年制高校),并全额补贴学费。即便如此,芬兰高等教育入学人口的中值年龄(median age)是23岁(美国是19岁),而获得学士学位的中值年龄为28岁(美国则为24~25岁)。将芬兰和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比较公平吗?这显然是一个反问句。把较早形成的后殖民高等教育体系与新建立的后殖民高等教育体系相比较合理吗,比如将阿根廷和塞内加尔进行比较?这明显又是一个反问句。

不是说一个国家不应该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而是不应该采用人口比例这种方式进行比较。

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口数据

经合组织采用基于普查的人口比例来解决其30个成员国在统计上报教育数据时方法不一致的问题。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各个国家采用的普查方法也是不同的,如瑞典的人口普查指标就不同于葡萄牙的人口普查指标。此外,当在教育宣传领域没有发言权的普通民众看到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的数据并询问有关生育率、人口增长率、移民净流入率和海外出生人口增长等问题时,他们会禁不住认为美国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在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中,只有法国、新西兰、墨西哥和美国这4个国家的生育率等于或高

于2.0的人口替代率(replacement rate),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的移民净流入率为负值。在人口增长方面,有7个国家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另有还有5个国家几乎也为零,而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则是0.9%,位居第五。在2008年全年移民净流入率方面,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爱尔兰高于美国(美国仅计算合法移民)。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显示:出生在海外但现居住于美国的人口数量在过去15年里增长了45.7%,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高出一倍多。流入美国的移民,大多比较年轻,且绝大部分在义务教育年限较短的国家接受教育,其到来增大了美国人口的基数。展望2025年,现在的人口普查数据预示那时25~34岁年龄组的人口数将增加430万,其中74%是拉美裔,14%是亚裔。无论是经合组织成员国还是其他国家,你能找到另一个和美国情况类似的国家吗?就像前面提到的,与众不同的人口统计数据让人感觉美国好像在另一个星球上。

笨蛋,关键是数学!

你四年级学的数学会帮你理解问题的要害。欧盟预计到2025年其传统的大学适龄人口将会减少900万,日本预测将减少11%。那么,当分母大幅减小而分子保持不变、微微增加或减小时,百分比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根据四年级学会的数学,当分母大幅上涨而分子保持不变或小幅上涨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些计算都不费什么脑子。在目标年龄组(target-age-bracket population)的学士学位获得率方面,美国和那些负面报道中经常使用的对比国家之间的差距会继续扩大。不幸的是,由于那些报道用贬低自己的方法来实现宣传效果,以便影响政策和企业,要教会这些聪明的成年人最基础的数学和人文地理学知识,看来是对牛弹琴。他们不想听到这些东西。

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

为什么理解上述所有问题如此重要呢?

较之5年前,经合组织2008年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人口比例统计数据的不足,因此开始提供诸如高等教育群体存活率(cohort survival rates in higher education)之类的指标。推动这种认识的是在46个欧洲国家实行的博洛尼亚进程,根据该进程的安排,每个国家有20%~80%不等的大学生正处于3年制的学士学位学习阶段。当学士学位从过去的4年或者5年制转变成现在的3年制,猜猜看其毕业率会发什么变化?将这一趋势与人口基数下降综合在一起考虑,就会发现一些欧洲国家的人均学位获得率将直线上升。这个结果除了大大有利于那些危言耸听者之外,对其他人理解自身的处境或者国际比较中的真正问题毫无帮助。对于那些尚未很好使用普查法的非经合组织国家来说,进行人口比例比较更是有问题的。

下面所讲的问题更加重要。经合组织的这些数字不能告诉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反而引导我们远离真正的任务,即把我们授予的文凭改造成有意义文件的任务,让它们代表着我们的学生具有了参与世界竞争的学问与知识。与其沉溺于人口比例数据,还不如考察一下博洛尼亚进程的行程安排:制定学位资格框架;建立一套可以为各学科的学习成果提供参照点的“调节”方法(“tuning” methodology);设立学科基准,让学生明确地知道能从自己的学习历程中期望什么,让公众也明确地了解高校应该负责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制定文凭补充证明(Diplomas Supplements),以确保学生的学位获得率;采用更为灵活的入学方式;通过地域编码确定和锁定大学生中的弱势群体。博洛尼亚进程虽然进度缓慢但很坚实,它的这些特点正在为高等教育塑造一种全新的全球范式。就这一点而言,其他国家确实做得不错。我们应该对这一切加以研究,在学习如何让美国转入全球变革激流中去的过程里,可能还要经历一两次顿悟。

作者注:本文根据最初发表在2008年12月15日的《高等教育内部》(Inside High Education)这一在线报纸上的文章修改而成。

香港本科教育的重构

Martin J. Finkelstein, Elaine M. Walker

Martin J. Finkelstein: 美国西东大学 (Seton Hall University) 高等教育学教授, 曾作为富布赖特项目的高级学者在香港从事研究; 电子邮箱: finkelma@shu.edu

Elaine M. Walker: 西东大学与香港大学的访问学者

2004年, 香港政府批准对其下属的8所公立大学进行一项重大改革, 即众所周知的“3-3-4 学制改革”。到2012年, 完全集中在职业或学术领域的三年制本科学位教育将被包括大量非专业或通识教育内容的四年制本科学位教育所取代。虽然促成香港政府进行该项改革的因素很多, 但其中有两个最为重要: 一个是希望确保香港在未来全球知识经济中的竞争力, 另一个是使香港的教育与中国大陆、美国及欧盟的教育接轨。

从表面上看, 香港的“3-3-4 学制改革”是政府对大学施加深远变革的另一种经典案例。然而, 有两个因素将香港的“实验”与典型的政府干预区别开来: 首先, 政府的指令鼓励每所大学根据自己的使命和历史确立各自的特点; 其次, 这些大学已经获得了大量的缓冲时间, 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适当的额外资源。

由大学拨款委员会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资助的8所公立大学包括: 3所传统的研究密集型大学 (英语授课的香港大学、双语授课的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香港科技大学), 2所先前的多科技术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浸礼会建立, 1987年被纳入公立大学系统), 香港岭南大学 (主要进行本科博雅教育) 和香港教育学院 (专注于师资培训及硕士生培养)。

当前的发展状况

香港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正规的学术治理框架下建立了教师和行政管理队伍, 以推动学校的规划进程, 其中一些大学还设立了新的行政职位来指导这一进程。大学拨款委

员会要求大学每两年递交一次报告。目前所有的大学都已全心投身于本科第一年的过渡体验设计中, 大部分学校正集中精力进行专业的重新设计, 以促进具体的学习目标, 包括再次强调课堂以外的经验 (比如校外实习与服务), 到大陆、亚洲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交换学习的机会。

教师面临的挑战

如此广泛的课程重建带来了若干重大挑战: 谁将进行课程开发与传授? 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吸引“最优秀”的教师以牺牲其科研和学术成果发表为代价来落实这些新举措? 研究密集型大学必须创建一种方式, 以一种不被视为威胁到教师长期职业利益的方法, 将教师吸引到课程重建中来。如果这种方式不能把足够多的普通科研教师吸引过来, 那么是否需要招聘新型的教师来从事这项特殊的通识教育工作?

不论对小型还是大型高校来说, 有效地实施这些新的教育改革, 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谁来从事这项工作? 目前的教师吗? 还是一批新型的教师? 从长远来看, 代价和收益是什么? 香港的大学, 尤其是那些研究型大学, 需要在这一教育职能创新和为提高学校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地位而必须开展的相关科研活动之间加以平衡。

评估面临的挑战

最后, 评估也面临着挑战。这些改革需要恰当的评估方法来证明其教育目标正在实现。大学将如何确定这一套新的课程、实习机会和海外学习确实正在实现预期的结果? 这一问题需从多个层面来回答, 包括单个的

教学项目、教师、学校，以及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这些评估至关重要，不仅是改进（或质量保证）的基础，而且是决定新教育秩序成本与收益的基础。相比之下，科研评估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

是不是新的机会？

一些大学，尤其是 3 所侧重于科研的大学，以“3-3-4 学制改革”为发展契机，增加

了 10%~20% 的教师，扩大了从事学生服务的专业人员队伍。这种扩张为重塑和改革教师队伍，提供了一个极好（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未来的 10 年里，香港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是检验在政府指令与开明的政府支持共同作用下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成效的虚拟实验室。

新书简介

Ackers, Louise, and Byrony Gill. *Moving People and Knowledge: Scientific Mobility in an Enlarging European Union*.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9. 288 pp. \$125 (hb). ISBN 978-1-84376-985-9. Web site: www.e-elgar.com.

该书分析了高技能人才在欧盟内部的迁移模式,讨论了人才流动问题,包括回流模式。该书还探讨了人才迁移网络、迁移过程、对孩子和家庭的影响以及人才输出国和输入国的经验等。

Angulo, A. J. *William Barton Rogers and the Idea of MI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0 pp. \$55 (hb).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ISBN 978-0-8018-9033-8.

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非常与众不同的大学,它源于19世纪中叶高等技术教育(technical higher education)在美国的发展。罗杰斯(Rogers)作为该校的创始人和重要的思想家,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极其重要。该书把罗杰斯的个人传记与麻省理工学院早年的理念与发展结合在一起呈现给了读者。

Bastiaens, Jo.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and State-University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39 pp. \$95 (hb).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ISBN 978-0-415-99074-5.

该书详细研究了对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的国际援助,讨论了受赠国政府机构与国际捐赠者在援助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其中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援助项目是研究的重点。书

中的研究结果虽然是关于印度尼西亚的,但对了解全球范围内捐赠者与受赠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有价值。

Byram, Mike, and Fred Dervin, eds. *Students, Staff and Academic Mo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313 pp. (hb). ISBN 978-1-847186034. Web site: www.c-s-p.org.

该书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国际流动进行了探讨,并着重分析了欧洲国家和以色列的情况。书中包含若干对比分析,部分章节还分析了教师流动的情况。

Ehrenberg, Ronald G., and Charlotte V. Kuh, eds. *Doctoral Education and the Faculty of the Fu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320 pp. \$35 (hb). Web site: www.cornellpress.cornell.edu. ISBN 978-0-8014-4543-9.

该书作者所关注的是美国高等教育中许多学科领域即将出现的教师短缺问题,讨论的主题包括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的博士学位完成项目(doctoral completion project)、获得学位的时间、少数族裔攻读博士的机会、吸引女性攻读博士(特别是攻读自然科学的博士)等问题。书中还分析了博士教育的国际化问题。

Enders, Jürgen, and Ben Jongbloed, eds. *Public-Private Dynamics in Higher Education: Expectations, Development and Outcom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7. 525 pp. \$49.95 (pb). ISBN 3-899942-752-1. Web site: <http://dnb.ddb.de>.

该书强调了全世界公立与私立高等教育界限日益不清晰的问题。公立高等教育正以不同的方式变得更加私有化,私立高等教育的作用则变得更加复杂。多个国家的个案研究都说明了以上观点,为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的趋同和趋异提供了证据。

The Evolving Regulatory Context for Private Educ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Discussion Paper and Case Stud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9. 65 pp. (pb). ISBN 978-0-8213-7778-9. Web site: www.worldbank.org.

该书聚焦于私立高等教育的监管问题,讨论了质量保证机制、私立学术机构建立的规章等问题,然后分析了9个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

Gumprecht, Blake. *The American College Town.*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8. 438 pp. (hb). Web site: www.umass.edu.umpress. ISBN 978-1-558849-671-2.

虽然其他国家也存在“大学城”这种模式,但这种模式在美国非常普遍。该书对美国的一些大学城进行了分析,如堪萨斯州的曼哈顿、俄克拉荷马州的诺曼、密西根州的安娜堡等。书中讨论了这些城市的发展历史及其与大学的关系,以及最近在这些大学附近出现的高科技和其他研究型产业(research-based industries)。

Jacoby, Barbara, ed. *Civic Eng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009. 262 pp (hb). Web site: www.josseybass.com. ISBN 978-0-470-38846-4.

公民参与教育(civic engagement)包括本科生的服务性学习活动、公民培养和校园活动参与。该书审视了美国公民参与教育的项目和方式,讨论的问题包括公民参与教育与通识教育、大一的经验、跨文化能力与公民参与教育、公民参与教育的评价等。

Keller, George.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New Socie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188 pp. \$26.95 (hb). ISBN 978-0-8018-9031-4.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该书深入分析了人口状况和其他社会趋势,特别是技术如何影响美国社会和高等教育,作者认为学术界必须思考这些变化并继续关注自己的传统价值。

Kezar, Adrianna and Jaime Lester. *Organiz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Collaboration: A Guide for Campus Leader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9. 289 pp. \$40 (hb). ISBN 978-0-470179368. Web site: www.josseybass.com.

该书重点讨论了如何开展校内合作(campus-based collaboration)。书中对科研、管理和教学项目合作中多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目的在于改善学校里的合作氛围。

Lamont, Michèle M. *How Professors Think: Inside the Curious World of Academic Judg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29 pp. \$27.95 (hb).

ISBN 978-0-674-03266-8. Web site:
www.hup.harvard.edu.

该书对学术界的同行评议过程进行了高度原创性的研究,分析了6个学科领域中专家评议组进行决策的方式,因为在奖学金和科研项目的遴选过程中都有专家评议组的参与。虽然本书主要研究美国的情况,但作者认为对其他国家也有启示意义。

Lin, Justin Yifu, and Boris Pleskovic, eds.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8. 285 pp. \$29.95 (pb). E-mail: feedback@worldbank.org. ISBN 978-8213-7123-7.

该书收录了世界银行所举行的发展经济学年会(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的论文,重点探讨了与高等教育有关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书中所讨论的主题包括技术人才与国际经济、全球的高等教育经济回报、高等教育与移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财政、高等教育与创新等。

Martin, James, and James E. Samels, eds. *Turnaround: Leading Stress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xcellen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306 pp. \$45 (hb). ISBN 978-8018-9068-0.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美国的高校由于财政困难、自然灾害、招生问题或其他严重的困难而面临“存亡危险”,该书作者讨论了高校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对如何有效利用数据、法律挑战、公共关系和有效利用领导力等进行了分析。

虽然本书主要关注美国的情况,但对其他国家也有启示意义。

Martinez Alemán, Ana M., and Kathryn Lynk Wartman.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on Campus: Understanding What Matters in Student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53 pp. (pb). ISBN 978-0-415-99020-2.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该书研究了美国学生利用Facebook网站进行交流的问题。书中采用访谈法,包括个人访谈和焦点团体访谈,展现了校园中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快速变化的情况。作者在书中强调理解学生交流模式对学生文化和校园生活的重要性。

O'Meara, KerryAnn, Aimee Lapointe Terosky, and Anna Neumann. *Faculty Careers and Work Lives: A Professional Growth Perspectiv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8. 221 pp. (pb). Web site: www.josseybass.com. ISBN 978-0-4704-3971-5.

该书作为高等教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系列研究报告中的一本,旨在对目前有关高等教育关键议题的研究进行分析。书中关注的焦点是美国学术职业的变化。作者通过审视目前的各种研究,指出了研究中的若干关键议题,如对终身教职制度的攻击、与日俱增的问责压力、教师队伍的人口变化等。

Palfreyman, David, and Ted Tapper, eds. *Structuring Mass Higher Education: The Role of Elite Institu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45 pp. (hb). ISBN 978-0-415-42604-6.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该书讨论了精英大学在大众化教育系统中的作用。研究型大学往往被看作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独立的一部分。对于高等教育系统如何处理研究型大学的问题,该书提供了若干案例,其中包括拉丁美洲、德国(包括其卓越计划)、挪威、英国、波兰等。该书还对美国常春藤联盟的精英大学,日本、法国等国的精英大学进行了研究。

Reinventing Higher Education: Toward Participato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ngkok: UNESCO Bangkok, 2008. 120 pp. (pb). ISBN 978-92-9223-205-4.

该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教育署(UNESCO's 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 Bureau for Education)赞助的一个会议的成果,对大学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重点探讨,同时还讨论了质量保证、社区服务性学习、国际服务、参与性研究等主题。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Hiroshima University. The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i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d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s. Hiroshima, Jap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2008. 432 pp. (pb). ISBN 978-4-902808-45-2.

该书是“变革中的学术职业”这一重要的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包括对该项目及其方法论的总结,以及绝大部分参与国的案例研究。

Ricard, Ronyelle Bertrand, and M. Christopher Brown II. Ebony Tower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Evolution, Mission, and Presidency of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erndon, VA: Stylus Publishing, 2008. 150 pp. \$29.95 (pb). ISBN 1-57922-274-1.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

该书研究了美国一些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大学(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校长的态度和观点,特别注重从校长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院校的使命。

Shattock, Michael, ed. Entrepreneurialism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Divers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Maidenhea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9. 237 pp. (pb). ISBN 978-033523571-1. Web site: www.openup.co.uk.

该书广泛讨论了欧洲高等教育中的创业精神(entrepreneurialism)。本书基于一个由欧盟资助的研究项目,讨论了组织变化、私立高等教育、国际化与知识社会、欧洲的知识经济等专题。

Smith, Bruce L. R., Jeremy D. Mayer, and A. Lee Fritschler. Closed Mind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278 pp. \$32.95 (hb). ISBN 978-0-8157-8028-1. Web site: www.brookings.edu.

许多保守派人士认为,左派在美国大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大学教学中存在一种自由主义偏见。该书利用调查数据、访谈等材料证明,不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不存在自由主义偏见。作者认为,美国大学的政治性已经淡化了,因此没有履行其使命。

World Bank. Accelerating Catch-up: Tertiary Education for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9. 180 pp. (pb). ISBN: 978-0-8213-7738-3. Web site: www.worldbank.org.

该书是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高等教育所做的一次以政策为导向的全面报告, 书中讨论了投资高等教育对非洲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以及提高非洲高校水平的策略。

《高等教育全球展望》系列丛书最新书讯

《高等教育全球展望》系列丛书(Global Perspectives series) 由 Philip G. Altbach 担任主编, 为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所有。该系列所有的书都是平装版, 目前已出版 14 本, 大部分定价为 45 美元。欲获得更多的信息, 请联系森斯出版社 (Sense Publishers, www.sensepublishers.com)。

Jane Knight. *Higher Education in Turmoil: the Changing Worl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241 pp. (pb). ISBN 978-90-8790-520-0.

该书收录了奈特 (Jane Knight) 11 篇有关国际化的重要论文, 讨论的问题包括跨界高等教育、财政问题、《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理解国际化的模式。

Simon Schwartzman, ed. *Un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Research Centers.* 269 pp. (pb). ISBN 978-90-8790-523-1.

该书聚焦于拉丁美洲大学在科研中的作用, 特别是这些大学在那些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学研究中的贡献。讨论的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与科研职能、校企联动、学术创业等。书中还包括对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的个案研究。

Hebe Vessuri and Ulrich Teichler, eds. *Universities as Centers of Research and Knowledge Creation: An Endangered Species?* 269 pp. (pb). ISBN 978-90-8790-478-4.

该书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研究与知识论坛”(UNESCO Forum o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Knowledge) 所资助的一项研究而成, 讨论了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学者们都强调在世界学术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大学科研职能面临新的挑战。大部分作者认为, 学术环境不太利于科学研究, 特别是基础和发展性研究 (developmentally relevant research)。书中的个案研究主要是有关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 也有几章研究英国、波兰和荷兰的个案。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介

为了加快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直属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称高教院)。高教院下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编辑部。

高教院坚持以实证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标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为标志，在政府咨询方面已经产生广泛的国内影响。

以小规模、创新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培养高等教育学、科学与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在站博士后总人数的规划目标为 80 名，且大部分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留学生比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团队，有选择地追求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定量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等领域打造国际学术品牌。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GSE aspires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mphasiz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policy studies and consultation.

GS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of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and updated annuall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s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policies, which are provided to Chinese govern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have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GSE focu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cifically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three research groups, namely the Center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centers will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teams, lead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GSE will uphold the best academic values—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and original inquiry,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Guoji Gaodeng Jiaoyu

(Translated from Number 55, Spring 2009,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U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urrent Recession	33
Chinese Graduates' Employment: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35
The Poor and the Rich in US Universities	37

International Issues

Regional Citation Indexes.....	39
Wolves in Chancellors' Clothing	41

Patterns and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Bologna Process: A Weary Leap Forward	44
Poland: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46
Double- and Joint-Degree Programs.....	48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50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The Centrality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52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Colombia's 2019 Vision.....	54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Problems in China's Private Universities.....	56
---	----

Statistical Challenges

A Closer Look at the OECD's Tertiary Statistics	58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What Your Fourth-Grade Math Can Reveal	60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Reinvention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62
---	----

New Publications	64
-------------------------------	----